

石球的再研究

□ 陈哲英

石球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石器类型,曾有文章专门论述过^[1]。

石球,石质球形也。其表面全部或部分为打击方向不一的凹凸不平的零乱片疤,人工痕迹非常清楚。“台面角”大于 90° 。有的保留部分或较多的砾石面,器呈球状,有圆与不圆之分,也有大中小之别。这种器物在考古学文化中常用“石球”来称之。

“石球”一词,就目前国内所能够看到的资料而言,最早见于有关丁村材料的报道中,其中裴文中是这样说的,“石球——我们在襄汾丁村发现了相当多的球形的石头……内中有一部分是不能再行打片的石核。但有一部分,上面有许多敲砸的痕迹,可能是作为敲打石片用的的石槌。”^[2]可是在“丁村报告”出版时,研究者没有使用“石球”一词,而是启用了“球状器”这一名称,并且纠正了上述的一些看法,明确指出“这一类型的石器,显然不是打击石片所剩下来的不能用的石核,而是有意识地打成了这种球状器物。”^[3]同时指出它的用途有两种:“(1)作为狩猎用的投掷的武器;(2)当作石锤作为敲砸之用。”^[4]尽管在其后来的有关这类器物的报道中,有的被称为“球形石”,有的被称为“球状器”,还有的被称为“准石球”等等,但使用最多的还是“石球”这一称呼。就其本性来说,它应该是一种“球状形)器”——即人工打造的一种呈球状的器物,而不应该叫做石球。即使叫做“球形石”,也还有不尽善尽美之处。因为它没有体现出人工作为,仍有自然球形石之嫌。自然界是有很多未经加工而成为球形的石头的,有的甚至达到了很圆的程度,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直径相等的真正的圆形);“在这批‘石球’中,确有许多无论从大小还是从重量上看都适合做‘投石

索’,其效果与人工打制的石球并无差异。因此,不能排除远古人类使用这样的‘石球’的可能。”^[5]正是为了区别这种自然界的石球和人工打造的呈球状的器物,我们认为把后者称为“球状器”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考古报道中所说之石球,无疑都是球状器约定俗成的结果,或者说“石球”已经成了球状器的一种代称或简称。它的出现,很可能与人类最初曾经使用过自然界的“石球”有关。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当人类用于狩猎的自然界的石球不能满足需要时,一种承袭乃至替代自然石球的新型武器——球状器,也就在人类大脑与双手的辛勤劳作下,很自然地诞生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人类最初使用的自然石球是哪些!

球状器是人类专门制造的一种用于狩猎的球状器物。由于其呈球状,重量比较集中,压强也大,使用起来具有阻力小、速度快、运行稳定、杀伤力强的特点,无疑是狩猎的最佳首选武器。它能够和自然界的石球区别开来,并能够从多面体石核和石锤中脱颖而出,迅速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实在是球状器的幸运,值得可庆、可贺。

关于球状器的用途与使用方法,很多学者都有过专门论述,有的还借用民族学的资料来论证。稍感不足的是“伴兽索”、“飞石索”^[6]、“投石器”、“流星索”和“抛石索”^[7]等等这些复合工具的使用以及利用器械原理将球状器投射出去射杀动物的方法,应该说都是“当今”社会少数民族的做法,它不足以证明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也已经普遍使用了这样的方法;即使是有一些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话,或许历史的长河已经发展到了如贾兰坡等所说的“在旧石器时代比较靠后的阶段里,特别是那些不太大的球形石,

有没有可能是狩猎的用“飞石索”(bolas)? 我们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9]1979年,贾兰坡等又进一步指出:“中等大小的(石球)可以作为‘飞石索’;最小的可用作飞石索上握在手上的扣环;但大的显然难以作飞石索使用,但(它)无疑的也是一种投掷武器。”^[10]很显然,贾兰坡等已经把石球分成了大中小三类,并对其使用方法进行了区分,即大的作为“投掷武器”,中等的作为“飞石索”,小的作为“扣环”。由此看来,球状器的大小及其使用方法是与其生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重量的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可能一样;使用方法的不一樣,所需球状器的名称也就应该有所区别。鉴于此,我们建议在将大中小三种类型的石球都纳入“球状器”的前提下,再根据其大小重量与其使用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石球、石弹(弹与丸本为孪生兄弟,这里指小于石球,大于石丸的球状器)、石丸这样三种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形成的器形与重量由大到小递减的类型。至于说多大重量称之为石球、石弹、石丸?这有待于大家的共识。而这个共识的基础,是源于资料,源于实践。

这里我们仍以许家窑的球状器为例,提出一点需要今后予以修正和补充的意见。

众所周知,许家窑是目前国内已知出土球状器最多的一处遗址,其数量多达1千余件。贾兰坡曾依其重量将其分为大中小三个型号,即“大号的重1500~2000克;中号的重500~1500克;小号的重90~500克。”^[10]李超荣也是把许家窑的球状器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的。不过,他是把大号球状器锁定在1501克~2500克;把小号球状器锁定在50克~500克;而中号球状器仍然是501克~1500克^[11]。若以后者所说之最大号球状器和最小号球状器相比,其重量相差可达2450克,或者说,大号球状器的重量是小号球状器的50倍,这是一个重量相当悬殊的数字。这样的重量悬殊,使用过程中肯定是不一样的。统以石球称之,则很难体现出球状器的真正意义和实用价值。倘若以石球、石弹、石丸三类来代替大、中、小三类石球,则很容易给人一种形象、具体、直观的视听感觉,也容易使人感受到当时人类狩猎的壮观场面和浓浓的生活情景。

前面已经提到,石球是球状器中的大者。考虑到它是投掷狩猎的武器,其重量相对来说要大一些。手既能握得住、握得稳,又能投得出、投得远。投掷时虽不像运动员的动作那么规范,但却完全是凭借手臂乃至全身的力量,将石球投向想猎获的动

物,致其伤残或死亡。根据目前对球状器的观察,其直径在8厘米以上、重量在800克以上的球状器称为石球是可行的。倘若以这样的重量作为“飞石索”等方法使用,不但需要灵活身体的支撑与配合,还需要有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够使石球在空中转动起来,抛得出去;同时,捆绑石球的绳索也需要有一定的长度和韧性。这样的条件在今天来说,或许是容易办到的,可在生产落后、生产力低下的旧石器时代,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重量在千克左右的石球,使用起来恐怕就更困难了。我们知道,投掷石球是用单臂或双臂来进行的,可这是一种近距离的行为。人类为了获取较远距离的猎物,就得设法延长自身的器官,复合工具及一些简单器械的发明与使用,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它们所需的大量球状器相对来说也就小了许多,石弹、石丸的使用,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从已发现的球状器分析,石弹的直径在5~8厘米之间,重量在200~800克之间是适宜的;石丸的直径则在5厘米以下,重量亦在200克以下,目前已知最小的一件是阳高神泉寺材料(正在研究中)中的石丸,重量仅有32克,长宽厚“三轴”没有一轴是超过3厘米的。

这是我们根据多年来对球状器的观察和结合球状器的大小及重量所确立的一个基本框架。需要声明的是,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不可能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即使是我们现在按器形的大小与重量的多少将它们分开了,但在实践中亦是难以分清楚的。可以肯定,在使用过程中,石球与石弹之间是有瓜葛的,石弹与石丸之间亦会常有纠缠现象,决不可能像石球与石丸那样分得那么清清楚楚。

球状器是一种极具特色的传统性工具,不但分布面广,而且纵贯整个旧石器时代。1994年,李超荣曾对我国出土球状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作过统计,计有11个省市的31处遗址和地点中有球状制品1280多件。它们分别是早期地点7处,球状制品36件;中期地点9处,球状制品1180多件;晚期地点15处,球状制品64件^[12]。事实上,当时发现的球状器地点和件数远不止这么多,很可能有些材料还没有来得及报道。如今时间又过去了10年,发现球状器的地点和件数就更多了。笔者仅就手头的文献资料,把一些能够说明球状器大小的地点,用表格的形式(附表)作一简单记录。

附表

中国球状器出土情况简表

出土地点	件数	三轴长 (厘米)	重量 (克)	原料	研究者	时代		资料来源	备注
						地质	文化		
辽宁庙后山	2	10.0	930	石英砂岩	辽宁省博物馆 本溪市博物馆	中更新世晚期	旧石器时代初期	《庙后山》。1986	洞穴堆积
		6.0	300	石英岩					
陕西甜水沟	1	11.5×10.5×10.2	1520	灰岩砾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大荔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早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早期早一阶段	《大荔—蒲城旧石器》。1996	DY15 地点 属“甜水沟文化”
陕西梁山	不详	6.2~9.0		石英砾石等	黄慰文 祁国琴	中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初期	《人类学学报》1987) 6 卷 2 期	采集品。石球在各类石器中占 7.1%
河南小空山	2	8.9×7.07×8.69	794	石英岩砾石	南阳地区文管会	更新世中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	《中原文物》1982 年 1 期	洞穴堆积
		6.98×6.76×7.34	587						
河北新桥	1	6.0	339	石英砂岩砾石	梅惠杰、程新民、陈全家、郭禄堂	中更新世晚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	《人类学学报》2001) 20 卷 1 期	
丁村 79:02 地点	3	10.0	1485	砂岩、石灰岩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	中更新世晚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	《文物季刊》1994 年 3 期	
		6.0							
山西万荣西桌子	8	6.0~10.0	1000	砂质灰岩	汤英俊、宗冠福、徐钦琦	中更新世		《人类学学报》1982) 1 卷 2 期	直径多 10 厘米左右,重多 1000 克以上
山西匭河	3	8.5~9.5	1035	石英岩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	更新世中期的早期	旧石器时代初期早一阶段	《匭河》。1962	系标本 P2472 的尺寸与重量。时代有晚的可能
安徽巢湖市望城岗	12	9.0	1300	石英砂岩、石英岩	方笃生	更新世中期或稍晚	旧石器时代	《文物研究》总第六辑 1990.10	表内系 2 件标本的大小重量最大者直径 10,重 1600; 小者直径重 450
		9.0	1250						
北京人遗址 8-9 层	4	7.95×7.43×7.25	510.5	石英、砂岩、石英石	裴文中 张森水	中更新世	中国猿人文化早期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1985	球状器的大小为平均值
鸽子堂石英层 Q)	1	10.0×9.6×8.8	1197	石英			中国猿人文化中期		
北京人遗址 4-5 层	1	4.2×4.3×4.2	101	石英			中国猿人文化晚期		
北京人遗址 1-3 层	2	9.0×8.4×8.2	1425	石英					
		12.6×9.1×8.8	1518						
陕西龙岗寺	40	5.5~9.5	300~1350	脉石 37) 火山岩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	上更新世早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	《史前研究》1986 年 3-4 期	打击石球 32 件,碰击石球 5 件、砸击石击 3 件。一般 7~9 厘米
江苏放牛山	6	8.8~11.7 9.5~11.2 8.3~11.2	1014~1685	石英砂岩、硅质岩、砾岩	房迎三、王结华、梁任又、王菊香、翟中华、杨春	中更新世中晚期	旧石器早期	《人类学学报》2002) 21 卷 1 期	
沅水下淤)	3	10.0	1000	硅质岩 2) 砂岩 1)	席道合	中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早期后段	《江汉考古》2002 年 1 期	
丹江口市连沟 ()	2	106×10.65	1251	石英砾石	祝恒富	中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早期	《华夏考古》2005 年 1 期	
		10.0×10.3	1230						

续表 一)

出土地点	件数	三轴长 (厘米)	重量(克)	原料	研究者	时代		资料来源	备注
						地质	文化		
新绛西马村	10	11.7	575~1440	砂岩 1)、泥灰岩 1)、石灰岩 8)	王向前	中更新世晚期	中更新世晚期后一阶段	《史前研究》1987 年 4 期	三轴长为最大者长度,重量为最大和最小者,一般直径为 10.0 厘米,重量为 1200 克
周口店第 15 地点	2	9.6×8.7×7.6 5.5×5.5×5.2	853 208		高星	更新世中晚期		《人类学学报》2001) 20 卷 1 期	
阳高许家窑	14		(大) 1284 (小) 112	脉石英、火山岩、石英岩、砂质灰岩	贾兰坡 卫奇	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考古学报》1976 年 2 期	
阳高许家窑	1059	大) 10.0 以上 (小) 5.0 以下	1500 以上 100 以下		贾兰坡、 卫奇、 李超荣	中更新世晚期	大于 10 万年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 年) 17 卷 4 期	
丁村	不详		(大) 1500 以上 (小) 200 左右	石灰岩、闪长岩、石英、砂岩、石英岩	裴文中 贾兰坡	更新世晚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	《丁村报告》。1958	一般在 500~1300 之间
丁村	9	6.2~10.5, 5.9~10.2, 5.4~9.0	100~1221	灰岩为主	刘源	晚更新世早期		《人类学学报》1988) 7 卷 4 期	三轴平均值为 9.7、9.1、8.6 厘米,重 931 克
丁村 80:01 地点	26		(大) 1960 (小) 355 平均 927.3	石灰岩、闪长岩、脉石英、砂岩	临汾行署文化局、 丁村文化工作站	更新世晚期早一阶段	丁村文化组成部分	《史前研究》1984 年 2 期	文中 23 件石球的重量为 410~500 克, 1 件; 501~1000 克, 16 件; 1001~1500 克, 3 件; 1501~1960 克, 3 件
丁村 80:01 地点	12	7.5~10.6	400~2500	石灰岩、闪长岩、脉石英、砂岩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	晚更新世早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	《文物季刊》1994 年 3 期	JP1999 的重量和原料
丁村 76:006 地点	23	5.6~11.5	383~1533	灰岩 14 件)、砂岩 9 件)					
丁村 76:007 地点	3		1314	石灰岩					
丁村 76:008 地点	24	6.1~11.1	313~1812	多为石灰岩					
丁村 79:05 地点	10	7.3~10.0	604~1285	其中角页岩者 1 件					三轴长及重量为平均值
霍县赤峪	1	10.0~11.0		脉石英	王择义	晚更新世	与“丁村文化”相近		
曲沃里村西沟	6	9.0~10.0		石英岩、砂岩	顾铁符		旧石器时代	《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 8 期	其中 3 件为采集品
曲沃里村西沟	1	大小和丁村相同		石灰岩	贾兰坡	更新世中期之末或晚期之初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末期或中期的初期	《考古》1959 年 1 期	
曲沃西沟	1	10.8×9.56×9.41			刘源	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中期之末或晚期之初	《人类学学报》1986) 5 卷 4 期	

续表 二)

出土地点	件数	三轴长 (厘米)	重量 (克)	原料	研究者	时代		资料来源	备注
						地质	文化		
陕西大荔	1	10.5	1450	石英岩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大荔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中更新世晚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	《大荔——蒲城旧石器》。1996	DY9 地点 属“大荔文化”
丹江口市连沟	5	9.76~9.94	1092	石英砾石	祝恒富		旧石器时代中期	《华夏考古》2005 年 1 期	轴长及重为平均值
河津山王村	2	10.0 左右		石灰岩、砂岩	赵凌霄 刘武	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中期	《人类学学报》(1999) 18 卷 1 期	
陕西梁山	150	6.3~13.0	318~2432	95%为脉石英	阎嘉祺 魏京武	中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	《史前研究》1983 年创刊号	基本采集于岩石表面
甘肃庆阳姜家湾寺沟口	2	8.0~9.5	1032	石灰岩	谢骏义 张鲁章	与丁村遗址时代可能相当	旧石器时代中期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 15 卷 3 期	该标本编号为 GP0009 图号为 GP0005
安徽宁国县河沥溪镇	2	6.9×6.9×6.8	450	砂岩	房迎三	中更新世或稍晚	旧石器时代	《文物研究》1988 总第 4 期	
		9.4×8.9×8.0	840						
陕西育红河	1	10.9×9.9×8.7	1126	石英岩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大荔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晚更新世中晚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	《大荔——蒲城旧石器》。1996	DY11 地点 属“育红河文化”
江西潦河	2	9.0	897	脉石英	李超荣 徐长青	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人类学学报》(1991) 10 卷 1 期	表内系 1 件标本的大小重量
江西新余	1	11.0×11.0×8.5	1228	脉石英	李超荣、侯志远、王强	晚更新世晚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学学报》(1994) 13 卷 4 期	
甘肃刘家岔	21	(大) 7.1~8.0	350~615	石英岩、硅质岩	甘肃省博物馆(谢骏义)	晚更新世中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	《考古学报》1982 年 1 期	大石球 5 件 小石球 16 件
		(小) 4.5~5.4	100~190						
呼和浩特东郊	1	7.9		燧石	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晚更新世	旧石器时代晚期	《文物》1977 年 5 期	
丁村 77:01 地点	9		1430	石灰岩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	Q ₃	旧石器时代晚期	《文物季刊》1994 年 3 期	
和顺当城	11	3.5~6.5		脉石英	吴志清 孙炳亮	更新世晚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学学报》(1989) 8 卷 1 期	洞穴堆积, 编号为 83001
云南丽江木家桥	10	10.7×10.36×9.14	1257	斑岩	卫奇 黄慰文 张兴永	上更新统	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学学报》(1984) 3 卷 3 期	另 5 件留县文化馆
		10.15×9.65×8.36	1304	石灰岩					
		9.44×8.54×8.46	937	脉石英					
		9.24×8.67×7.73	787	石灰岩					
		7.46×6.85×6.32	385	石灰岩					

表内所列举的球状器都或多或少有着说明其大小和重量的一些数据,但并非是所列球状器都有其全部数据。还有很多出土球状器的地点,诸如三门峡地区的水沟和会兴镇 黄慰文,1964)、安徽宁国县的毛竹山(房迎三等,2001)、山东莒南县的大青峰(徐淑彬,1987)、内蒙古清水河的喇嘛湾、柳子岭 张森水,1959、1960)、下川富益河圪梁 王建等,1978)、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文化 汪宇平,1979)、辽宁海城小孤山 张镇洪等,1985)、山西永济介峪口 魏海波等,1985)、安徽宣城地区 房迎三,1988)、安徽巢湖市 韩立刚,1990)、呼和浩特市大窑四道沟东区 汪宇平,1987)、湖北三浪滩、小梁子 祝恒富,2002)等地点,就没有提供其大小的任何信息,故未列其中。再有就是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球状器,已知出土球类器物最多的是西安半坡遗址,有球状器 240 件,还有陶球 327 件^[13]。由此可以看出球状器在人类生活中的强大生命力,并且有着其他工具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社会就是在这种生产工具不断完善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下面我们简单地解读一下球状器简表。

我们本想通过这样一张表了解一下全国到底有多少个省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出生了多少件球状器,按照通常划分地质与文化时代的做法,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地点各有球状器多少;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知道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阶段内,球状器是怎样演变的,是由大到小的变化,还是由多到少的变化;由于我们没有能够把全国出土球状器的地点和件数全部列入表内,加之,列入表内的球状器也没有把其全部信息收罗在内,因此很难回答上述问题。但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球状器就已经有了不同的类型——这种类型或许是无意中产生的,或许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使用产生的,它们不失为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因而也就可能有了不同的运作方式,只不过最初投掷狩猎是其主要狩猎方式。这样说或许有些主观,但从半坡遗址来说,240 件球状器中,有所谓的大球状器 70 件,直径达到了 6 厘米,可以说完全符合石弹的标准,其余的均在 6 厘米以下,或许都属于石丸之类。这意味着当时人类距离所猎获的动物越来越远了,投掷狩猎已没有什么优越性,机械的或复合工具的使用,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巨大威力,并且逐渐成为主要的狩猎方式。

我们再说一下球状器的原料。表内已经或基本上说清楚了,有石英、灰岩、石英岩、砂岩、石英砂岩等 10 多种原料以上,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要数石英了。但这种原料并非是球状器所独有,而其他类型的制品也有使用这种原料的,只不过是相对来说少一些罢了。事实说明,石英制作有尖类有刃类的工具,不如石英岩、燧石等结构致密的原料多。这是因为石英的化学成为 SiO_2 ,“晶体呈六方柱状,常呈晶簇、粒状、块状等集合体。”^[14]这样的原料不但在制作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就是制作出的尖也易折,刃也不齐,且不耐用,往往达不到理想的使用效果。相反,石英砾石制作球状器还是比较容易的,不管其大小如何,只要打制成球状就算达到了目的。圆与不圆对于球状器来说,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石英砾石多的地点,石英球状器就可能多一些;或许可以这样说,石英球状器的多少,是跟当时当地的石英砾石的多少有关系的,但并非是成正比的关系,即使是石英很多,当时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不需要更多的球状器,那么我们现在也不会有更多的石英球状器发现。至于说有的地点附近没有这种原料,而有这种原料的制品,则很可能是某种自然营力搬运的结果,而不可能是人类为制造球状器大规模、长距离的搬运原料所致。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发现的人类的真正的遗址还不算多^[15]。

贾兰坡等曾指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匭河—丁村系”,或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一个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简称第一地点—峙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16]。从这两个系统来说,以山西为例,属于前者的匭河—丁村系有球状器的存在,贾兰坡等还以球状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的存在为理由,把匭河和丁村的“垂直关系连贯起来”,从而得出“丁村文化是由匭河文化发展而来的”^[17]结论;属于后者的许家窑和下川亦有球状器的存在。尽管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下川富益河圪梁的球状器就属于“下川文化”,但从表中得知,“细石器文化”遗存中是有球状器存在的。这不但说明球状器是重要的狩猎工具,在原始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说明两种文化传统中都有球状器的存在。球状器不再是华北旧石器文化匭河—丁村文化传统中的纽带,而且是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重要成员。认真地把发现球状器的文化遗存加以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对于旧石器文化传统的认

识和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研究,或许都有所帮助。

本文是在王志俊鼓励下完成的。卫奇看过本文的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11][12] 李超荣《石球的研究》,《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2] 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年。

[3][4] 裴文中、贾兰坡《丁村旧石器》,《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裴文中主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甲种专刊第2号。科学出版社,1958年。

[5] 郭俊卿、董祝安《汾河上游“石球”之谜》,《化石》1985年第3期。

[6] 耀西、兆麟《石球——古老的狩猎工具》,《化石》1977年第3期。

[7][13] 宋兆麟《投石器和流星索——远古狩猎技术的

重要革命》,《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8]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9] 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第17卷第4期。

[10]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14]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缩印本)。1979年。

[15] 陈哲英《旧石器时代“遗址”浅识》,《四川文物》1985年第2期。

[16]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7]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匭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5号。科学出版社,1962年。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接33页)

而不是总统所内的官职。

[21] 首领官在金元两代地位介于官与吏之间,主要掌管案牍,管辖吏员,协助长官处理政务,首领官与吏员在元代官僚机构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由此可见造像施主郭经历在总统所内的地位与作用。

[22] 关于行宣政院,详见邓锐龄《杭州元代行宣政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3] 《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

[24] 《元史》卷十七《世祖十四》。

[25] 拙稿前揭文。

[26] 参见拙文《关于元代设于江淮的释教都总统所》(未刊)。

[27] 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附录二,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121页。

[28] 参见《关于元代设于江淮的释教都总统所》前揭文。

[29]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册,第729~730页。

[30] 参见《元史》卷二十四《仁宗一》。

[31] 确切地说,“江南诸路释教都总统所”或“江南总

摄”的机构名署及机构长官的职衔并不存在。

[32] 中统二年(1261年)西夏行省设立,后改为甘肃行省。元代有“西夏僧总统”一职,见《元史》卷三十三《文宗二》。

[33] 参见注[16]。

[34] 注大都路设都僧录司(而非通常的僧录司)掌管佛教事务,应与其京城特殊地位有关。正如元代的路一级行政设总管府,而大都路及上都路则升总管府为都总管府。

[35] 参见《1284年大都崇国寺圣旨碑》②,《元代白话碑文录》,第33页;(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第179~180页,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9年版,第179页。

[36] 高念华主编前揭书,第141页。

[37] 具体情况为:第3龛华严三圣系宣授杭州路徐僧录与潭州李僧录至元十九年造,第62龛普贤骑象系平江路僧判王邦麻斯至元二十七年造,第91龛密哩瓦巴与侍从三尊系平江路僧录范真造。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考古学会)